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view

中国传播学评论

张国良 主编

- 释法莫立法，立法即违法
赵心树等
- 解读凯利·新闻教育与传播之别
潘忠党
- 重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
詹姆斯·库兰
- 作为社会生产的新闻
霍尔等
- 从欧美崇拜到亚洲偏好
石井健一
- 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实践
郭建斌

第一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编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view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播学评论

第一辑

主编 张国良

副主编 杨 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播学评论. 第一辑/张国良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309-04699-4

I. 中… II. 张… III. 传播学 - 中国 - 文集

IV. G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9710 号

中国传播学评论. 第一辑

张国良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章永宏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25 插页 1
字数 247 千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100

书号 ISBN 7 - 309 - 04699 4/G · 607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编的话

张国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与改革开放同步,传播学引入中国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

25年来,这一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曲折走向光明的历程,令人信服地表明,学科的成长、学术的发展确有客观规律,不以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方面,信息时代的来临、网络社会的形成、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等世界潮流(它们彼此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共同建构了传播科学得以持续繁荣的宏大背景,以及传播学人皆可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另一方面,知识和思想的积累,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外同行的切磋和交流,相关学科的碰撞和激荡等学术作为,又不断提升着这一学科的水准,包括推动着其研究、教育力量的壮大。

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系列进步的轨迹:从传播学课程的开设、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立、本科专业点的问世,到大量论文的发表、众多专著和译著的出版、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再到全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国家重点研究基地的组建、国家重点学科的诞生。

短短25年间,取得这样的骄人成绩,既可说是“水到渠成”,又不可忘“饮水思源”。除了各种外部条件的作用之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其中凝聚了诸多先驱者的巨大辛劳。由此,还可引申出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作为学人,我们应始终保持谦虚的心态,因为任何个人的聪明才智及其贡献,都是有限的,都只是浩瀚“学术银河”中的一颗“星星”(尽管彼此有大小明暗之区分)。没有前人、没有同人,就没有作为学者的个人,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我们存在的可能。

第二,作为后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当然应始终高扬创新的精神,力争超越前人,因为这不仅是对前人的最好回报,而且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基于以上思路,我们不断探索着前进的方向。

于是,在到达目前这样一个学科建设亟待向纵深推进的时刻,发现了一个问题,即:迄今为止,中国传播学界还缺少这样一种出版物——它集中刊登传播学的论文;它主要发表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不问作者的名声和地位,只看作品的质量和贡献;它既服务中国,密切关注本土的现实课题,又放眼全球,敏捷追踪国际的理论前沿。也可以说,它以成熟、权威的国际核心期刊为楷模,肩负如下重任:集纳成果精粹,推动学

术交流,培育研究团队,深化学科发展。

为此,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迈出了试验的一步——按照上述指导原则,推出了这样一部论丛。无疑,它一定还存在着各种欠缺,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相信,在传播学科与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它将一步一个脚印,不断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幼苗”成长为“大树”。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同类出版物出现,最终形成一片茂盛的“森林”。于此,最不可缺少的“阳光”和“雨露”,则是来自广大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真诚地期盼着。

2004年10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主编的话	张国良 (1)
------------	---------

研究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实践	
——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	郭建斌 (1)
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	
——基于 CSSCI (1998—2003) 的研究	徐 剑 (29)
电视剧、文化与传播新技术	
——从《笑傲江湖》的接受与反馈看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特性与	
传播新技术的作用	柳 珊 (40)
在市场和体制的压力下求存:大中华地区新闻从业人员对争议性	
采编手法的态度及其成因	陈怀林 (58)

海外特稿 (Research Articles)

释法莫立法,立法即违法	
——评主张司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各种理论	赵心树等 (77)
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	潘忠党 (103)
从欧美崇拜到亚洲偏好	
——日本人对亚洲文化兴趣的变化	石井健一 (125)

学生论文 (Research Brief)

民工的媒介接触及评价调查研究	
——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陶建杰 (132)
建设者还是破坏者	
——沪上三大报纸报道中的民工基本形象分析	李淑媛 (140)

译文选粹 (Selected Translations)

作为社会生产的新闻	霍尔等 (148)
-----------------	-----------

重估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新修正主义..... 詹姆斯·库兰 (154)

书评 (Book Review)

话语分析:如何为媒介等社会语言实践提供说明?
——费尔克拉夫和他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殷晓蓉 (171)

社会力场中的图像传播
——读《摄影的力量——照片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顾 铮 (178)

国外主要传播学杂志摘要

《欧洲传播学季刊》(*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1)

《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2)

稿约及论文体例 (203)

电视、象征资本及其在一个特定社区中的实践^①

——独乡个案之田野研究

郭建斌

(云南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本文以位于中国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作为研究个案, 借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象征资本”概念, 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了梳理。文章从介绍这一社区的相关背景情况开始, 接着探讨在这样一个社区中为什么拥有和使用电视会具有“象征资本”意涵。在此基础上, 文章以布氏“象征资本”构成的三类资源(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这一理论建构为思路, 对这一“象征资本”的来源进行了追问, 强调“政治资本”在获取这一“象征资本”时的实际作用。此外, 对这样一种“象征资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作用, 以及这一“象征资本”对乡村社会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 文章依次做了回答。分析这一个案,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和传统的权力关系如何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下得以实践。

〔关键词〕 电视 象征资本 少数民族社区

引 子

电视与少数民族社区, 作为一类研究话语, 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具有现实与理论两方面的意义。这样一类研究话语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得到凸现, 是由媒介发展实践决定着的。从国家宏观政策的角度来考察, 始于1998年的“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 再次掀起了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遍及全国的“媒介推广、普及”的高潮。这在东部发达地区, 表现得不是很明显, 但是对于西部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 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这次“媒介推广运动”从性质以及运作方式上看, 与发端于1950年代初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建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中国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地区)都是在那

① 本文是我2003年5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答辩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个部分。复旦三年, 除了第二年因进行田野调查没有在学校, 其他两年的时间都是在复旦度过的。我的导师张国良教授给了我始终如一的关怀, 包括鼓励我去做田野调查, 和我讨论工作思路, 以及调查结束后写作思路上的指导。复旦新闻学院的陆晔、黄旦两位教授也曾多次不厌其烦地听我讲各种田野“故事”, 并耐心地帮我理清写作思路。我的同学、室友吴飞始终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鼓励着我。我和室友陈建云度过了博士论文写作中最黯淡的日子。现在澳门大学教书的王旭老师在我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就他个人对于这项研究的价值的高度肯定表明了他对我的支持, 并在以后一直不断地帮助我, 直到现在。潘忠党老师在近三年来给我无偿提供的资料 and 思想会让我终身受益, 就在这篇论文初稿出来后, 潘老师还提出了最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很多给我工作提供过直接、间接帮助的老师、朋友、同学, 以及在独龙江调查期间对我照顾倍加的李金文全家, 所有帮助过我的父老乡亲, 我的父母、爱妻、家人, 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 2003-10-20

〔作者简介〕 郭建斌(1969—), 男, 云南普洱人, 云南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次“媒介推广运动”的直接作用下第一次听到广播的,其成果一直保留到1980年代末期。1980年代开始的针对整个中国农村进行的改革,是促使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迅速瘫痪的一个直接动因,在此之后近20年的“村村通广播电视”,是农村“有线广播网”工作思路的另一种实践方式,其实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①。这样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媒介实践形态自然值得关注。这样的关注,无论是为决策咨询提供直接的参考,还是进行学理上的探讨,立项与立论的面向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选择的只是学理探讨层面的一个面向,没有以点代面的企图,更不希望由此引来对某些政策措施的误解。

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半年的时间里,我选择了位于云南西北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选择这个社区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更多的是一种此前对这一村庄的两次说不上深入的体会^②:这是一个中国56个民族中人数极少的民族——独龙族唯一的聚居地,由于区位、自然环境、历史等原因,相对于国内不少乡村(也包括少数民族乡村)来说,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地域文化中还残留着较为浓郁的原生态意味,跨地域、民族、行业之间的交往极为有限。更引起我的研究兴趣的是这个村庄在1980年代末期建起了地面卫星接收站,与国内很多农村一样看上了电视。从最表层的意义上来看,这样一个社区与国内很多社区一样,在国家政策以及市场因素的直接作用下,步入了一个范围无法确定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社区传统的、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往的现代传媒社会中。我们目前还很难给这样一个社区贴上“传媒社会”的标签,但是,电视进入了这样一个村庄,一个在50多年前还处于“刻木传信”的原始交往方式的村庄,一个历史上少受汉文化的浸润、目前大多数群众对汉语掌握还无法达到比较自由交流程度的村庄……因为电视的进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自己觉得这样的问题有回答的价值,也有回答的必要。

即便是一种关注于变化状态的研究,要对其进行理论上的回答,可以作为研究切入的点也是多方面的。在时间不算很长的田野调查中,我真切感受到的是一种围绕现代传媒手段展开的权力的实践形态。这种权力的实践形态既表现在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之中,也表现在社区之外的更为庞大的社会权力系统中。同时,还表现在社区、民族的传统与现实的维度上。为了对这种社会关系进行“深描”,先从这一社区的背景情况说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社区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部的独龙江峡谷,行政级别是乡,简称独乡。地理坐标是北纬27度40分至北纬28度50

^① 见拙文《一种体制话语中的乡村传播策略(简论)——以广播电视为例》。

^② 此前在1994年8月和1999年9月,我曾两次到这里进行过短时间调研。

分,东经 97 度 45 分至东经 98 度 23 分。独乡北与西藏林芝地区相连,西、南与缅甸接壤,历史上是连接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缅甸的重要通道。独乡目前土地面积 1 994 平方公里,占贡山县总面积的 44% 左右,人口为 4 000 多人,约为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都是独龙族。此间中国境内独龙族人口总数为 6 000 多人,有 70% 左右居住在独乡。从独乡朝东到贡山县城要翻越的高黎贡山一年中有半年积雪不融,只能保证半年的畅通。1999 年 9 月,由中国交通部等部门扶持援建的从贡山县城到独乡孔村的公路毛路通车,此举被媒体誉为“结束了‘我国唯一未通公路的少数民族(独龙族)’历史”的伟大壮举^①。在此之前,独乡与县城的最主要通道,是一条建成于 1964 年的从县城到当时的乡政府巴坡的 60 公里左右的人马驿道。无论是现在的公路还是以前的人马驿道,每年 12 月前后至次年 5、6 月份约半年的时间因积雪封断,车马绝迹。2001 年冬天的封山时间较往年晚一点,正式封山时间是 2002 年 1 月 17 日。2002 年 4 月 21 日我离开独乡时,高黎贡山上的积雪还未消融,4 位独龙族兄弟翻雪山把我护送到贡山县城。

由于独乡独特的区位及气候条件,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被喻为“东亚物种多样化的一个中心舞台”^②。因此,这一地区已经成为很多从事植物、生态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实现梦想的土地。

独龙族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土著民族,古称“僇”、“球夷”、“求夷”、“俅人”、“曲子”等,1952 年定名为独龙族^③。至于族源,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只是从语言系属上分析,独龙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因此大致推断出独龙族是古代氐羌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独龙江一带的独龙族有文字记载始见于樊绰所撰《云南志》,但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郡以来,居住在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就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实证。中央政权对这一区域的管理,有确凿的证据是唐代以后,包括唐人所撰的《云南志》,以及元、明、清各朝的史籍,尤以清代史料为详。综述之:唐宋时期归南诏、大理国政权管辖;元明时期,属丽江木氏土司;清雍正元年(1723 年)改土归流,建维西厅,怒江一带分属几个土千总,菖蒲桶(今贡山)和俅江(即独龙江)北部属察瓦龙藏族土千总(藏称新俄)管辖,南部属康

① 见《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14 日(第 2 版),《云南日报》1999 年 9 月 13 日(第 1 版)等报纸。

② 转引自何大明、李恒主编:《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第 9 页。

③ 关于独龙族的族名的得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1 年,受上级委派,孔志清到了云南民族学院政治系学习,当年年底到北京参加中央民委扩大会议,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1952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参加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周恩来和每个民族的代表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名字,从哪里来?是什么民族?当轮到孔志清时,他握着总理的手说:“我叫孔志清,从云南最边远的独龙江来,我们的民族过去被人叫为‘俅子’,我自己称为独龙族。”总理听了孔志清的话后对身边的西南局书记王维舟说:“老王,你记住,这个民族的族名,要以本民族的称谓使用,不能以别个民族的称谓为族名。”这段话是孔志清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下的话,我们今天的独龙族的称谓,就是始于孔志清与周恩来的这段简短的对话。参见《独龙族》一书,第 98—108 页。

普、叶枝土目管辖。

由于地域封闭,生活在这里的人从古到今鲜为外人所知。从晚近的有些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居住在独龙江的先民们的情形。清道光《云南通志》载:“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复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裤,跣足,妇女耳缀大铜环,衣亦麻布,种黍稷,鬻黄连为生,性柔弱,不通内地语言,无贡税,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若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①

独龙族无文字,古以刻木记事,“刻木”也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刻木”这种记事、传信方式最后消失的时间无法精确计算,但从有关学者的研究记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独龙人盛行以刻木传达信息,以结绳记事”的表述^②,现在还健在的六七十岁老人,还清楚地记得这段历史。1934年至1936年,时任职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在滇西一带做人种调查,到过独龙江,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还保存着一片由当时的“贡山设治局”为陶先生签发用于独龙江之行的“刻木”^③。其功能类似今天的介绍信。

1949年8月25日,贡山宣布解放,由于交通通讯的闭塞,直到1950年雪山开山后,居住在独龙江一带的人才知道贡山解放的消息。1950年9月30日,独龙江召开了全区各民族各界大会,宣布独龙江区公所正式成立。

从1950年代末期进行的民族调查存留下来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能够对这一社区当时的大致情况有一个粗线条的了解:“到1956年为止,独龙族尚未越过原始社会末期的铁石木器并用时代”;“农业耕作还处于刀耕火种、轮歇耕作的原始锄挖农业阶段”;“采集、捕鱼、狩猎在生活中还占很大比重”;“家族之间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土地形态有家族共耕、伙有共耕、私有共耕及私有私耕几种,其中以“伙有共耕”为主;婚姻形态已由群婚发展到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同时还保留着一些群婚的残余;传统的三四代人同居一室的大家庭开始分解,表现为家庭数量增加,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减少。

随后的40多年里,独乡更为充分地融入了全国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大跃进”、“文革”、土地承包,等等,每一次大的运动、改革,独乡都直接卷入。

据我本人的调查,2001年下半年,独龙江全乡完成了“村改委”工作,现有马库、巴坡、孔当、献九当、龙元、迪政当共6个村民委员会,42个村民小组。2001年底全乡人口4140人。乡政府提供的一组数字(2001年年末数)表明:人均经济收入685元,比1998年增加477元;大牲畜存栏878头(其中国家扶持180头);生猪存栏2097头;农作物播种面积11493亩,比1998年减少1053亩;粮食总产量达123万公

① 转引自《云南省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

② 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第181页。

③ 此信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王铭柯研究员提供,本人未见到过实物。

斤,人均有粮403公斤;全乡基本普及六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6.8%,巩固率为96%,文盲率下降了41.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99年、2000年、2001年三年上级下拨民政救济款105 000元,寒衣1 300袋,救济粮45 000公斤;乡镇企业及个体经营户6户,从业人员23人,总经济效益160万元;投入21 600张石棉瓦和铁皮瓦完成了140户安居工程;在省委民族工作队帮助下共投入109万元资金,扶持投放了2 050只山羊和211头种牛;采取国家投资群众投工投劳方式投入80万元建了孔当、献九当、龙元和迪政当4座微型电站^①,加上此前已有的麻必当电站(2×55千瓦)和马库村电站(7.5千瓦),实现了村村通电;成功安装了无线短波电话^②。此前只有一部电台能与县城直接联系。

在我调查期间每个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均能看到至少一套电视节目;2001年末,有小学16所,其中,中心完小1所,村初级小学6个,遍及6个行政村,另外9个为教学点。几乎所有村小、一师一校校点的校舍都做了翻新或改善。学校使用全汉语教学;全乡有8座教堂,信徒570人,除龙村以外,其余各村均有信徒。宗教活动的语言有傈僳语和独龙语两种;“南木萨”^③公开活动基本停止,只有北部迪村有几个“南木萨”偶尔进行半公开活动;南部的马村、巴村、孔村三村有水田,北部三村没有水田,只种旱地^④。自1990年代初期推广地膜种植以来,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产量有了明显提高,此法在各村已经基本推广;主要食物是玉米和土豆,也有采集野生植物作为食物的;服饰以汉装为主,不少是近年外地捐赠寒衣(当地人称为“难民服”),少有自己购买衣服的。作为独龙族传统服装是独龙毯,现在主要只当铺盖用,或是作为隆重节日的服装,当地不少妇女还织独龙毯,或是自家使用,或是用于交换;一年中主要的节日是元旦、春节、中秋节(基督教信徒过感恩节、圣诞节和复活节三大节),其中以春节最为隆重;独龙族传统节日“卡锵哇”已经多年未举办过^⑤;当地人日常交流的语言是独龙语,有少数人懂傈僳语和藏语,南部诸村的方言与相邻的缅甸北部“日旺”语言大致相同,可以进行交流,三分之二的人不能用汉语

① 关于这一数字,在李金明所写的《独龙江乡发展报告》(见“云南蓝皮书”《云南民族地区发展报告》)一文中有较大出入。李文中所说的四个电站投资情况分别是:孔当50万元,献九当53万元,龙元55万元,迪政当59万元,合计为217万元。见“蓝皮书”,第228页。

② 此电话安装在孔当村乡政府临时驻地,用于独龙江与外界(据说可以打国际长途)的联系,村与村之间没有电话。2001年12月开通,除当地政府和省委民族工作队有专用机组外,独龙江乡电信所有一台机组对外营业。但机器、线路故障频繁。使用者多为在独龙江从事工程建设的外地人以及当地机关职工或家属。详见本人调查日志中相关记录。以上数据来自独龙江乡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③ “南木萨”,即巫师,是传统的独龙族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南木”一词本意是“天”,在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中被引申为“鬼”,指居住在天上的众多的鬼。“南木萨”是“南木卜郎”即天鬼的替身。当地人认为,“南木萨”带有“南木聂”(即“鬼眼”),能看清世间的一切(李金明文,2001,第69—70页)。史料记载中所说的“不知医药之道,人病则请囊撒禳治之”,“囊撒”即“南木萨”。

④ 在20世纪50、60年代,北部三村也大规模地开挖过数量不少的水田,现在都已经变为旱地了。

⑤ 或许是出于尊重民族传统的角度考虑,当地政府规定每年的1月10日为“独龙节”,但是这一钦定节日与独龙族传统的“卡锵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大相径庭。传统的“卡锵哇”,被认为是迷信活动。

交流。

为什么拥有和使用电视具有“象征资本”意涵？

从传播形态演变的角度，我曾把这一社区的发展比喻为从“刻木传信”到“声光传播”的跨越^①，自从1980年代末期这一社区出现了电视到1990年代末期实现了“村村通广播电视”，这样一个侧面代表着这一社区社会发展的某种变化。

1950年代以后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建设，独乡同样地经历了，但是，目前这一村庄里已经看不到一点这项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工程的影子，只是在30多岁以上的人的脑海中，还保留着一点残存的记忆。在1990年代将近10年中，这一社区在有了电视之后几乎没有太大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村村通广播电视，是在1999年修通了第一条到县城的公路以后，各村在这年年底建成了一个小型电站，村公所（2001年下半年的“村改委”中改为村委会）所在地建起了地面卫星接收站，方圆一两公里内没有大山阻拦的村寨能够接收到由村委会转发出来的电视信号。但是，由于经济、电力等条件的限制，村庄里的电视机数量十分有限，由于居住分散，使用户均拥有的指标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从目前的电视机拥有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包括乡村两级）、驻军、学校的所在地无疑成为了中心。除此以外，有数量不多的农户家庭，或是通过购买，或是通过接受捐赠，拥有了电视机。

但是到目前为止，电视机在当地社会中还是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绝大部分农户家里没有电视机；由于电力使用受限，一般情况下是晚上定时供电，大约5个小时左右；相对于县城而言，这里能够收到的电视频道数量很少，“村村通”工程保证转发的一般是中央台一套和云南台一套的节目，也有个别村委会通过转发器选择这两套节目之外的其他地方电视台的节目；就村委会一级的情况来看，村委会领导负责电视信号的转发并负责电视机的开关；电视节目的通用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当地电视观众中大多数人并不能听懂电视语言；除了个人到市场上购买，当地最近几年都接受外地捐赠的电视机，我在村子里看到的不少人家的电视机是通过乡民政部门发放的，这一免费发放方式并非每个家庭都有平等的机会……以上列举出的这些表面现象，已经足以让我们觉察到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区中，拥有和使用电视就具有了一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 Bourdieu）所说的“资本”意味。那些有权力拥有和使用电视机的人与没有这种权力的人之间，自然地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区隔”（distinction）。

调查期间碰到的一件小事，或许可以作为这一问题最好的说明，一个10多岁孩子一个不经意的游戏行为，把对与电视有关的“资本”的渴望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2002年2月18日下午，在迪村一户人家建盖新房的工地旁，两个小孩正在用从工地上拣来的小木块玩着与城市里的孩子玩的“搭积木”类似的游戏。其中一个名叫定巴的小孩的家庭是全村最困难的，他几乎每天都到与他一块儿玩的另一

^① 拙文《从“刻木传信”到“声光传播”——对独龙江地区传播形态演变的描述》。

个小孩家看电视。他一边摆着小木块,嘴里一边说着:这是电视机,这是 VCD。他把 VCD 摆得像是一个我小时候生活的农村烧柴的老式灶台^①,添加柴火的灶眼是装 VCD 碟片的地方,他用石块、碎玻璃做了 VCD 碟片不断地更换,换碟之后他手舞足蹈地表现着“放映”出来的内容,非常开心的样子。他还特地为电视机和 VCD 装了一根外接天线——村里有人家的电视机是这样的,但是他却把“天线”接到了 VCD 机上。这个 15 岁还上小学二年级的少年阳光下的梦让人感动^②。两个小孩同在村小读书,平时他们是很好的朋友,正因为这样,定巴也最经常地到他的这个好朋友家看电视,可以坐在最靠近电视机的地板上,其他与这家小孩关系疏远些的孩子,大多是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这里所说的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具有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理论中“资本”的某些涵义,但同时也超越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布氏对于他所使用的“资本”概念的定义是:资本是累积性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小团体占有,这种劳动(资本)使他们能够以具体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③。很显然,布尔迪厄把资本的概念同各种形式的权力,包括物质、象征、文化或社会的权力形式相联系,资本从原有的物质状态延伸到文化符号领域。

在这篇文章写作时与潘忠党先生的一次信件交流中,潘忠党先生对布氏理论(包括“资本”概念)作了如下经过自己理解的阐述:

布尔迪厄的理论建构在根本层面坚持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通过资本及其形态和运用来分析阶级关系。但是,他力图超越马克思和结构主义者的一些基本二分概念,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构与 free agents,客观性与主观性等,这种试图导致他关注文化生产,并将文化生产置于人们“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各种关系场域(即不仅仅是分析固化了的“文化制品”)。在分析这样圈划出的考察对象时,他认为资本具有各种形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既然运用了“资本”这个概念,显然,布尔迪厄认为关系是考察对象的元素,其基本特性是投入与收益,以及分布和运作中的不平等,即权力;区分不同形态的资本,是为了说明,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有各种形态,它们虽然相关,但不可如马克思一样简约为经济关系。布尔迪厄在此表达了一种泛权力关系的观点,这与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福柯有异曲同工之处^④。

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的一般的经济学”中,符号的(象征的)和物质的利益被视为

① 独龙族生火做饭都在火塘边的铁三角上,在独龙语中,火塘即“灶”。

② 见 2002 年 2 月 18 日调查日志。

③ P. Bourdieu: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p. 241. 转引自《文化研究》第 4 辑,第 43 页。

④ 2003 年 7 月 27 日杨击师兄转发来的潘忠党先生对本文初稿的评阅意见。

利益的两个同等的客观形式。行动者的实践与“将物质和符号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有关,也即是说,布尔迪厄指出任何社会里的人群、阶级或阶层之间都会为了保证他们自身的再生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发生冲突,社会空间被看作由众多场域形成的等级组织,人类行动者卷入其中竭力获取相对于这个场域的特定资源——特定资本,以追求最大利益。基于布尔迪厄对行为的利益倾向的认识,他把智性实践看作具有象征性特征的、但根本上是和所有利益行动一样的实践行为^①。

在此基础上,我们为在这样一个社区中由拥有和使用电视所获得的权力与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之间,找到了一个理论上的结合点。同时,这一“资本”已经区别了一般经济意义上资本,属于文化资本的范畴;区别了一般物质意义的资本,属于符号的(或象征的)资本的范畴。另外,对于布氏“象征资本”的概念,还有这样一种理解:

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类型(物质和金融的财产)、文化类型(稀有的符号商品、技能和名位)以及社会类型(凭借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资源自然增长)。第四类型即符号资本,它确定其他资本形式的实际效果^②……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些资本(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采用的形式是符号资本。”^③

电视机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客观形态,具有“象征资本”的意涵,另外,在电视机的来源以及观看电视的行为等方面,又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各种资本来源类型的价值,采用着符号资本的形式,同样具有“象征资本”的意义。

正如布尔迪厄不是从应该是什么,而是从现实是什么来研究的思路一样,布氏的所有理论解释都是有条件的,对于“资本”(或是“象征资本”)概念的解释,也是同样。在独乡这样的社区中,因为电视机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又存在着种种限制条件,这使得同样的文化商品(布尔迪厄把它称为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社会行为(或是生活状态)具有了较之于经济较发达的社区、收视条件受到较少限制的地区更为鲜明的“资本”意味。这种权力的不平等状况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可能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描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侧面,或许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方面,但是从这样一个一般化侧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或许比某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具有普遍意义。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正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通过电视机拥有和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国家和传统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一个特定社区中得以实践这样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问题。

找寻到了这样一个理论上的结合点以后,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象征资本的来源,即:这一象征资本是如何获取的?

① 转引自《文化研究》,第44页。

② 转引自《文化研究》,第238—239页。本文为美国学者华康德所写的一篇名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介绍文章。

③ 转引自《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61页。

布尔迪厄“象征资本”概念的要素来自于并且可以还原为三种重要资源,即:“文化资本”(包括学术知识、教育程度、学校类型等方面)、“经济资本”(包括金钱、财产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等方面)、“社会资本”(包括职业声望、社会地位、人际网络及群体的团结等方面)^①。因此,在分析由拥有和使用电视所获得的“象征资本”的来源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三种资本类型所提供的思路来进行“还原”。根据独乡的具体情况,对于三种资源的具体内涵需要事先界定。就“文化资本”而言,我在这里主要是指当地人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反映着的“文化程度”、汉语听说能力以及对传统知识的熟悉情况;就“经济资本”而言,主要指金钱、财产两个方面;就“社会资本”而言,主要指社会地位、人际网络以及家族背景等方面。

我在这里对“文化资本”的获得区别出了三种主要情况: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反映着的“文化程度”。为什么要对“文化程度”进行限定,这是由独乡的特殊情况决定着。在调查访问中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直截了当地问“文化程度”,很多人不能理解,只好变换提问方式,问:你读过几年书?即便是这样提问,还是会碰到问题,有的人的回答是:读完了第三册。因此,在这里使用这样的表述用意是要把“文化程度”转换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而不是使用“初小”、“高小”、“初中”等模糊的表述方式。但这种衡量标准也有不相一致的情况,如有的人读了六七年的书,但只是小学三年级毕业,遂使用这样一个冗长的表述。二是汉语的听说能力,因为这一情况不能够简单地从“教育程度”中按一般的逻辑推理出来^②,而这一能力是构成当地人“文化资本”的重要方面,因此单列出来,作为一条考察“文化资本”的重要标准。三是对本民族的传统知识的熟悉情况,包括能熟记并讲述本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能较为清晰地记得一些传统的仪式过程、祷词并熟练地运用(或是现在还使用着)。这样的人往往在传统社会中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是研究传统社会

① 转引自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郭于华译),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一书。

② 我在迪村小学做过实地调查,从学校老师课堂教学使用的语言来看,一、二年级的课堂教学中几乎是绝对的汉语和独龙话对半(独乡学区的规定是一定要使用汉语普通话教学,但迪村小学一位有20多年教龄、有小教高级职称的教师对我说:学生刚进来很多人一句汉语也听不懂,不用独龙话进行解释是不行的),用汉语先讲一遍,再用独龙话进行解释。这种方法对数学课的教学还可以,语文课就难了。那位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村子里有些小孩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就被哥哥、姐姐带到学校,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之后,很多语文课文他们都能背诵了,但却是一个字也不识。全文背诵没问题,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让他(她)念,就哑了。三、四年级的学生,基本上可以用汉语进行课堂教学,但偶尔还需要用独龙话进行解释。或许是学生真的能够听懂,但是他们却几乎不用汉语交流,或是出于羞涩,或是出于胆怯,或就是一种对于外来文化的“非正式抵抗”。我多次听学校的老师说起过这一我已经有深刻体会的问题。2002年1月初在巴村参加过一次乡中心完小组织的学生家长座谈会,学校负责人向学生家长呼吁在家庭日常交流中培养学生使用汉语的习惯。这样的呼吁多少有点校方的一厢情愿的味道,至少我没有碰到有一位农村家长用汉语与自己的子女交流。我访问过的不少人是上过一两年的,但是由于少有使用的机会,长期不用,汉语的听说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了。甚至有些在几年前就读完了小学的人,无法用汉语进行沟通的还大有人在。从当地政府的统计报表中,我看到的当地人的“教育程度”并非十分糟糕,近年来,独乡各校区每年都有协助村基层组织完成一定数量的人口“脱盲”的任务,从乡政府的统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从1999年到2001年,全乡文盲率下降了41.7%(见独龙江乡《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1月)。但是若要拿“文化程度”、“脱盲”的标准衡量当地人的汉语听说能力,则是不准确的。

个人“文化资本”重要的方面。现在的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方面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意义在由于电视的到来所构筑的新的社区关系中还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经济资本”主要包含“金钱”和“财产”两个方面。这方面的调查非常困难,“金钱”可以用“经济收入”来衡量,但是即使在当地人经济收入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同样对这一数字难以细算,只能大概估计。“财产”一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我提出了这样三个衡量标准:一是房屋,二是土地,三是畜牧养殖的种类和数量。

就“社会资本”而言,根据独乡的实际,我选择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社会地位、人际网络以及家族背景。在这里,“社会地位”要考察的主要是是否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是否在村社中承担着某项职务^①。有无固定的工资收入在当地人眼里无疑是社会地位的最大的差别。比如说村支书的每月工资是385元,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收入,包括我访问过的独乡的很多村干部均抱怨这一工资太低,如果自己没有土地,不参加生产劳动,连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无法维持,更别说养家。但是,在一般的老百姓眼中,有这一固定工资的人与其他人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他们有工资,哪怕只是象征性的一点,从身份上就和一般的农民区别开了。我在这里提出的有无工资收入不是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的,并不看重工资收入的实际数量,而重在作为一种身份确定的标准。在一次私下交谈中,我问一个上小学4年级的小孩^②长大以后最想做什么,他犹豫了片刻,说出了两个字:“干部”。这位小孩看重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工资收入本身,而更是一种身份的向往。“人际网络”主要指与本村村民之间的日常联系或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本村以外的联系交往情况。家族背景主要指本家族或直系亲属中是否有成员在村、社或县、乡等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

有的人因为拥有和使用电视获得了“象征资本”,在追问这一“象征资本”的来源之前,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到底是哪些人最早获得了这样的权力?

在独乡,拥有电视机的情况主要有三类:一是公有,二是私有,三是公有私用。公有的电视机又有几种情况:乡政府所属各单位以及驻独乡部队,其他直属单位,这些单位或部门几乎都有电视机;六个村委会每个村委会至少有一台电视机;已经通电的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也有自己的电视机;独乡16所小学及教学点都配备了电视机,没有通电的校点,还配备了水轮机。私人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一部分是机关工作人员,这部分占了独乡私人拥有电视机家庭的大部分,二是农户。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从电视机的来源看,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地捐赠的,有崭新的,也有是已经使用过的,这部分电视机,主要是通过国家扶贫政策筹集到的。我在前面的背景情况介绍中提到

^① 在迪村村委会,领政府工资的只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武装干事四人,村民小组长、村(社)妇女主任、电工员等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根据各村的经济情况进行适当补贴。

^② 金文的儿子林高。见2001年11月3日调查日志。